

#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矛盾与模式探析

伽红凯

(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通过厘清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户福利提升之间的矛盾,分析在矛盾冲突下其得以留存的原因,以反映传统村落的发展现状及其保护的重要性;基于经济学视角,借鉴“公地悲剧”的破解思路,提出十种传统村落保护模式,即罚款与补贴模式、名录保护模式、文保模式、农民退出模式、农民自主开发模式、社区主导开发模式、公司主导开发模式、综合开发模式、博物馆模式以及保护区模式,为中国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利用提供路径选择。

**【关键词】**传统村落保护;矛盾;路径选择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6-0136-09

## Contradictions and Modes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Conservation

QIE Hong-kai

(Institution of Chinese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Abstract:**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 conservation for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urbanization,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new rural construction and farmers' welfare enhancing, and analyzes the reason why it can be retained under these contradictions, in order to reflect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 importance of protec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en protection mod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cluding fines and subsidies mode, directory protection mode, heritage conservation mode, farmers' exiting mode, farmers' self development mode, community-driven development mode, company-driven development mod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mode, museum mode and reserve mode, in order to provide the path choices for the sustainable utiliz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villages.

**Key words:** conservation for traditional villages; contradiction; path choice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农耕文明的重要展示窗口;凝聚着中华民族精神,是维系华夏子孙文化认同的纽带,是中国历史、文化、自然遗产的“活化石”和“博物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于2012年4月联合下发的《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将传统村落界定为“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

**【收稿日期】** 2016-08-15

**【基金项目】** 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江苏传统村落保护对策研究”(16SHC002);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科应急项目“江苏特色村镇保护研究”(SKYJ2016003)

**【作者简介】** 伽红凯(1986-),男,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讲师,科学技术史流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主要从事特色村镇保护与农村发展研究。

应予以保护的村落”。新时期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有利于增强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自信、保持中华文化的完整多样以及促进农村经济、社会、文化的协调可持续发展<sup>①</sup>。

然而现阶段,中国传统村落不断减少是历史的必然,随着“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传统村落不断遭受“开发性、建设性”破坏。与此同时,农户追求自身福利的提升也不同程度地对传统村落产生了破坏。因此,厘清传统村落保护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新农村建设和农户福利提升之间的矛盾,分析在矛盾冲突下其得以留存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探索传统村落保护的不同模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 一、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矛盾

### (一)传统村落保护与城镇化发展的矛盾

从传统村落保护的内涵与意义来看,它有着明显的“逆城镇化”特征。村庄作为基层特殊的社会经济系统,也应该存在一个相对适宜的规模范围,散落的、规模小的村庄会比大规模集中的村庄需要浪费更多的基础设施投入。从现实来看,传统的农村散居状态导致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与使用低效的问题,不利于农村经济的发展与乡村文明的传承。而要素集聚是一股无法抵挡的进展态势,只有集中众多要素才能实现降低成本、分享规模经济效益以及专业分工细化等优势。城镇化进程对要素集聚起到提速作用,即提高地区经济密度,加快劳动力、商品、服务、信息、知识、技术等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sup>②</sup>。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然产生村庄拆并、农民集中居住社区建设等要素集聚现象,在追求经济的同时统筹兼顾生态环境和社会效益,为传统村落保护带来契机。但是一味强调传统村落和文化的传承保护,会阻碍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传统村落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是对一般传统建筑的保护,更着眼于农耕文明和农民生产生活的整体保护与发展。基于土地与资本要素的稀缺、劳动力资源要素的单向流动等原因,传统村落现存的传统建筑风貌完整、格局保持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变得异常困难。

### (二)传统村落保护与农业现代化的矛盾

已有对传统村落保护的研究多数从保护审美、建筑、选址、民俗、自然环境、文化生态等视角展开,对传统村落涉及的农业生产方面的研究与思考较少。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传统村落的布局形态,生产方式的消亡是传统村落保护面临的最大困难,这主要是由我国传统农业生产的弱质性所决定的,“保护落后”一直就是个伪命题。与此同时,传统村落不具备培育新型农民的环境基础。不可否认,个别地方的农业生态系统一直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例如浙江青田“稻鱼共生”农业生态系统,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2005年还被列为世界农业遗产保护项目。但是随着农民不断向城镇稳定转移,农业内部的人地比例关系发生了变化,传统农业的精耕细作方式将受制于劳动力短缺、劳动力成本居高不下以及劳动力综合素质不足的现实,难以适应现代社会农业经济的发展。

### (三)传统村落保护与新农村建设的矛盾

传统村落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急需稳定的、持续的外部驱动力支持,而新农村建设可以凝聚政府、市场、投资和农业科技等多方面力量,为传统村落保护带来契机。新农村建设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强调把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保护贯穿始终,这与传统村落保护的内涵是一致的。

① 建村[2012]58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文物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

② 伽红凯、王树进:《我国农民集中居住的阶段转变与策略引导》,《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10期。

但在实践环节,新农村建设被错误地理解为农村城市化与旧村现代化,二者矛盾突出。新农村建设主要从政府需求侧考量,通过投资建设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为农民增收提供产业支撑,以便农民有更好的生活条件来扩大农村消费市场,实现投资—产—消费的闭合循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导致具有地方特色和研究价值的传统村落被夷为平地,大量传统建筑被拆毁,取而代之的是千村一面的农民集中居住现代社区。传统村落保护抑制了农村地区建设用地指标的置换,农村建设用地指标置换除了支持城镇化建设,还能够起到提升村级财力的作用,如返还的土地增值收益、个别地区利用多出的建设用地指标获取资产性收入等。特别是依赖“土地财政”经济增长方式的地方政府,对传统村落的保护意愿有待提升。

#### (四)传统村落保护与农户福利提升的矛盾

在传统的福利经济学中,福利被认为是个人或集体消费一定商品或服务而得到的效用。然而在实际中,用效用衡量福利具有局限性,无法反映出福利的全部内容。根据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可在评估功能性活动的基础上衡量福利,结合传统村落的特征,从农户的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居住环境和社会机会四个方面来考察农户福利<sup>①</sup>。传统村落本质上是年代久远的建筑群落,从传统村落认定的评价指标体系来看,足够面积的传统建筑是传统村落评估的基础条件。然而现实中能纳入重点传统建筑的比例较少,多数传统村落建筑为非重点传统建筑,原始居民拥有非重点传统建筑的使用权和管理权,但却没有传统建筑的保护财力与能力,进而产生“村外求保护、村内盼拆迁”的尴尬境况。房屋作为不动产是当代国人的重要家庭财产组成,一旦列入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房屋使用权的交易将会受限,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是农户福利的重要组成,传统村落保护强调保持村落的原真性和协调性,与村民现代化生活需求之间存在悖论,例如传统建筑采暖采光差、无法摆置现代家具、不便于现代交通工具进出,供暖、燃气、排水、通讯、卫生、餐饮等日常生活配套设施不全,抑制了农户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与此同时,农村劳动力受“配第定理与克拉克定理”作用,呈现出由农村向城市转移、由农业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特征<sup>②</sup>,传统村落“空心”现象严重,原住民在村落里继续就业、创业等社会发展机会匮乏。

## 二、传统村落得以留存的原由

### (一)特殊地理环境限制了外界对传统村落的破坏

地理环境是人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对社会历史发展产生多方面的影响。传统村落保护的矛盾决定了其脆弱性与保护的迫切性,山区、丘陵、滨海、盆地等特殊的地理环境能够延缓其开发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矛盾的激化与爆发,对传统村落起到保护作用。如浙江的南部中山区<sup>③</sup>,基于山区相对封闭的环境,原住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不大并得以传承,浙江省将近一半的国家级传统村落保留在这个区域范围内;而江苏的苏中、苏北平原地区,由于其相对开放的地理环境,交通便捷、开发便利,最终导致国家级传统村落留存数量极少。

### (二)各级文物保护部门的介入强化对传统村落的保护

①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颐、于真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② 伽红凯、王树进:《集中居住前后农户的福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江苏省农户的调查》,《中国农村观察》2014年第1期。

③ 按照地理学的标准,浙江省可以划分为六个自然区:北部平原区、西北中山丘陵区、中部盆地区、东部丘陵区、南部中山区、滨海区。

国家文物保护法明确规定:国家指定保护的纪念建筑物、古建筑、石刻、壁画、近代现代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除国家另有规定的以外,属于国家所有<sup>①</sup>。目前,我国共确定了七批 4296 处国家级文保单位,与此同时,还有数量庞大的各省、市、县等地方级别的文保单位。传统村落中有一些符合国家文保法规定的不可移动文物,一旦纳入文保单位,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会组织编制专门的历史文化村保护规划,并纳入城市总体规划,所需保护资金纳入地方财政预算,法规与行政力量的共同作用抑制了对这部分传统村落的“破坏性开发”。文保部门的介入是传统村落得以留存的重要原因之一,以浙江省碗窑村为例,它是一部研究浙南乡土文化、乡土建筑和陶瓷发展史的活教材,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1988 年 5 月,该村被列为第二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 年 1 月再被升级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文保部门的介入,使得村中 5000 多平方米陶瓷烧制作坊、30 余座 300 多间明清传统民居能够保存下来,古建筑和作坊、水碓房错落有致,交相辉映。

### (三)原住民贫穷导致的“无力开发型”传统村落保护

农民自发住房建设是改革开放后农村房屋变化的主要特征,尤其是 1980~1984 年间,农民年收入的增长率均超过了 10%,使得农民改善陋房的愿望增强,建国以来最大规模的建房潮就出现在这个期间,原有房屋变为平房甚至楼房,其中不乏具有重大历史、文化、建筑、科学价值的传统建筑遭到无情的破坏。需要注意的是,农户间的资源禀赋差异较大,有一部分农户由于贫穷或者常年在外地务工,无力或者无心重建原有房屋,于是形成了“无力开发型”保护。例如浙江省义皋村,是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沿太湖七十二浚港古代水利工程”的重要节点,当地农户由于贫穷或外出务工的原因,原有的古建筑未来得及重建,义皋村纳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后,受到地方各级部门的重视,这些传统建筑就可能被永久保留下来,包含有范家大院、义皋石街、义皋茧站、义皋商店古居、义皋港东古居、范家古居、盛家古居、周瑞华古居、王阿法古居等 18 处古建筑。

### (四)具有远见卓识的村领导对传统村落的行政干预保护

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取决于村民之间的复杂关系,由家族、户族或氏族相互交织并且依靠关系网进行管理,村支部书记是由村民普选产生,在村内拥有极高的声誉和威望,是村内主要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在村民管理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调研中发现,村支部书记的远见卓识也是传统村落得以留存的原因之一。例如浙江省荻港村,它是杭嘉湖平原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水乡古村落,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村里的老书记就有这样的判断:“随着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会不断追求精神生活,旅游文化的需求会不断增长,村里的古堂、古桥、名人文化等资源将是村里的宝贵财富”,在村民要重建房屋时,他组织引导村民在别处重建,并依靠村级财力把准备拆除的传统民居买断,经过若干年的积累,总共留下了 23 座古桥以及 36 座古民宅,如三瑞堂、礼耕堂等。如今,这些古桥、古民宅已经成为荻港村不可复制的发展优势。

### (五)名人效应影响下的传统村落保护

名人效应是重要的资源与财富,对区域发展起着持续有效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我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名人,他们有着举足轻重的文化感召力与吸引力,是不可多得的社会教育资源和历史文化资源。在现实中,有很多“一个人成就一个村”的案例,名人效应对传统村落保护的作用十分显著。例如广东翠亨村,它是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的故乡(1866 年诞生于此),在孙中山先生巨大名人效应的影响下,翠亨村 87 处老宅等各项传统村落资源保存完备,并且纳入了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每年吸引着国内外 150 万余人次的游客参观游览。

<sup>①</sup>《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5 年第四次修订版)。

### 三、经济学视角下传统村落保护的路径选择

经济学中根据物品竞争性与排他性的差异,把物品分为公共物品、公共资源、俱乐部物品和私人物品四类。如果把传统村落视为一个物品,其包含的传统建筑、格局保持及非物质文化遗产都具有不可再生性,原住民对传统村落的使用将影响甚至减少其他人对它的使用,即具备竞争性;传统村落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单元,任何人都有权去参观访问,即具备非排他性。显而易见,传统村落属于公共资源物品,此类物品在现实中通常会被过度使用,即产生“公地悲剧”,由此可以理解现实中的“荫余堂”<sup>①</sup>及其翻版事件的发生。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公地悲剧”的解决方案通常有四种:行政管制、矫正性税收与补贴、使用权竞拍和改变物品的属性。由于行政管制的手段不是以市场为基础的解决策略,在执行过程中无法调动多方保护传统村落的积极性,不具备可持续性,因此不作为主要的应对措施进行分析。

表 1 借鉴“公地悲剧”解决对策的传统村落保护模式及案例

公地悲剧解决对策	传统村落保护模式	特点	案例
矫正性税收与补贴	罚款与补贴模式	管理约束,对破坏的单位及个人罚款,对保护得力的单位和个人补贴	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条例(草案)、北京市门头沟区古村落保护办法
	名录保护模式	入选者奖励	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
使用权竞拍	文物保护模式	不可移动文物收归国有,政府专款修缮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
	农民退出模式	置换原有房屋,入住集中居住社区	浙江义皋村
改变物品属性	农民自主开发模式	个体发展民宿、农家乐、庭院经济等经营	浙江福德湾村
	私人 社区主导开发模式	内源式旅游整体开发	安徽西递村
	物品 公司主导开发模式	外源式旅游整体开发	安徽宏村
	综合开发模式	外源式旅游整体开发,公司示范带动、社区引导、农户参与	浙江荻港村
	公共 博物馆模式	政府财政支付,整体保护	贵州上郎德苗族村
	保护区模式	政府引导	河北井陉

#### (一)矫正性税收与补贴

收取矫正性税收与补贴,旨在实现外部性内在化,促进经济人考虑外在的成本,对私人的经济活动加以矫正,从而使市场价格能够反映真实的资源机会成本。对应的传统村落保护模式包括罚款与补贴模式、名录保护模式。

传统村落保护模式一:罚款与补贴模式 地方政府采取管理的措施,对破坏者采取罚款等形式惩戒,对保护者采取补贴等形式鼓励,两种手段都可以使大众正确认识传统村落的价值。在实践中,经济发达地区较多采取补贴的形式激励集体与个人自发保护传统村落,经济欠发达地区较多采取罚款的形式抑制集体与个人对传统村落的破坏。

① 荫余堂意指“荫求祖荫,余祈富余”,它是有着两百多年历史的古徽州建筑,1997年被美国碧波地博物馆买下,拆下的2700块木件、8500块砖瓦、500石件,装上19个40呎的货柜,运至美国,在塞冷镇重建,2003年正式开放,成为全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建置在海外的古徽州建筑。

案例:(1)罚款。贵州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对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条例(草案)进行了审议,条例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违反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规划改变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传统建筑的建筑风貌。在传统村落保护范围内开展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活动,对单位并处2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个人并处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sup>①</sup>。(2)补贴。北京市改革创新,出台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政策,比如门头沟区制定并公布了《北京市门头沟区古村落保护办法》,对传统村落、古民居保护进行科学性指导,并拿出补助资金对保存良好的传统村落进行奖励,对集体产权古民居修缮实行全额补助,对个人产权古民居修缮补助20%,提高了居民保护传统村落的积极性<sup>②</sup>。

传统村落保护模式二:名录保护模式 名录保护模式就是将传统形态完整、遗存丰富、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村落,一个个甄选和认定下来,列入名录,加以保护。名录保护模式也属于矫正性税收与补贴,住建部、财政部、文化部、文物部联合制定了传统村落评价认定指标体系,对达到要求的传统村落纳入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名录,并对入选者配套资金奖励。目前,我国已经认定了四批共4157个传统村落,住建部计划再发展认定最后一批,总数控制在6000个左右,此后将出台传统村落警示和退出办法,实行动态管理,有进有退。名录保护模式是我国传统村落保护最重要的模式。

## (二)使用权竞拍

使用权竞拍旨在通过资源使用权的拍卖,抑制资源的过度使用。这种解决方案对应的传统村落保护实践较丰富,目标是让适合的人参与传统村落保护,包括文保模式、农民退出模式。

传统村落保护模式三:文保模式 文保模式指的是政府相关部门对特别有价值的传统村落不可移动文物进行甄选,选出国家、省、市、县文保单位,将保护责任由农户及村集体向各级政府转移,保护资金支出纳入财政预算。世界各国的文物法律都是为了“保护”而制定的,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的《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日本的《文化财保护法》和埃及的《文物保护法》等。我国也不例外,1982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对传统村落保护作用不可小觑,是传统村落得以留存的原因之一,并将持续发挥作用。

案例:浙江温州金城村。金城村内的蒲壮所城1996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蒲壮所城是一座保存完整的明代抗倭防御体系,城内建筑号称“一亭二阁三牌坊,三门四巷七庵堂,东南西北十字街,廿四古井八戏台”。街巷布局以十字街为中心,基本上围绕“田”字形设计分布。全城除北面依山而外,跑马道环绕于城墙内侧,其他各街、巷、街坊设置均在城内“田”字形四方格内再次划分区域。村内房屋修建需要由具备文物保护工程设计资质的单位设计,并由具备文物保护工程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在关键环节上避免破坏的发生<sup>③</sup>。

传统村落保护模式四:农民退出模式 农民退出模式适用于“空心村”,留守村民以老年人居多,村落人口构成趋向“老龄化”,由于乡土观念、经济能力等原因<sup>④</sup>,他们不具备保护传统村落的能力,传统建筑也不具备继续使用的条件,农民退出不失为一种良性的保护策略。村集体在原有传统建筑附近修建新的房屋,或者把农户的房屋置换,农户进入集中居住社区。

① 关于公开征求《贵州省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的条例(草案)》修改意见的通知,贵州人大,2016-10-09, <http://www.gzrd.gov.cn/gzdt/lfgz/lfgg/23908.shtml>

② 《北京市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北京农经网,2014-06-17, [http://www.bjnyzx.gov.cn/ywgg/zyqh/201406/t20140613\\_335993.html](http://www.bjnyzx.gov.cn/ywgg/zyqh/201406/t20140613_335993.html)

③ 罗一南:《明代海防蒲壮所城军事聚落的整体性保护研究》,浙江大学学位论文,2011年。

④ 刘馨秋、王思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出路》,《中国农史》2015年第4期。



案例:浙江湖州义皋村。义皋村保存着湖州地区最美丽的原生态古村落建筑,数百年以上历史的原生古村落建筑有18处,在村民的生活中发挥着作用,但空心化问题严重,原住民不具备保护传统建筑的能力,继续使用传统建筑存在不安全因素。结合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规划,从规划层面宏观考虑,保留古村落,另外选址建设新村,合理利用古村的原有资源,通过有效更新和设施改造,改善村民的居住环境,保护古村原有的格局和历史环境风貌。此外,浙江省国土资源厅每年单列下达的农民建房专项新增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重点保障传统村落中无房户、危房户、住房困难户等异地搬迁建房用地需求,在政策层面予以保障<sup>①</sup>。

### (三)改变物品属性

改变物品的属性,一种方式是使公共资源物品具有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为避免“公地悲剧”的产生,考虑使传统村落具备排他性,即成为私人物品,这种解决方案所对应的传统村落保护实践为旅游利用保护,目标是让特殊群体(个人、社区或企业)对传统村落的保护负责,包括农民自主开发模式、社区主导开发模式、公司主导开发模式、综合开发模式。

旅游是文化传承保护的重要渠道,发展旅游可以增强文化的活力,也极大地促进了传统优秀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和发展。随着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旅游市场规模稳步扩大,旅游业增速领跑宏观经济,城市游客希望到乡村地区旅游,很多企业愿意到乡村地区投资旅游,旅游利用的外生动力已经形成;采用内源式(村民自发、社区主导)或者外源式(外部资本主导)旅游利用策略,将传统村落景观资本化、文化产业化,借助城市的消费市场,建立传统村落与现代城市的互动系统,这样就形成传统村落的旅游利用内生动力。传统村落通过旅游利用保护模式的优势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在科学规划的前提下进行旅游利用,实现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的权责统一,各方在旅游利用过程中获益,提升传统村落保护的可持续性;其次,游客既是体验者又是传播者,在游客参观体验的过程中,自然而然提升传统村落的社会影响力,还可以通过游客的设备将不可再生的传统村落记忆传播更远;其三,旅游利用模式可以促进当地农产品、文化产品、特色民族产品的销售,带动地方经济增长。

传统村落保护模式五:农民自主开发模式 农民自主开发模式指的是农户在保护传统村落资源的前提下,利用自己家的房屋、庭院、承包地开展餐饮、民宿、庭院经济、开心农场等活动。由于财力的限制,农民自主开发的规模一般较小,追求近期效益的“短视行为”是发展中要避免的首要问题。

案例:浙江福德湾村。福德湾村因耕地面积少,农业缺乏特色优势,主要经济来源为明矾石采炼加工,是一座历史上因采矾、炼矾而生、而盛的村落,被誉为矾矿采炼技术发展、工艺变迁“活的教科书”。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全长350米的福德湾老街,距今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农户自发开展免费伏茶、家庭微缩馆、民俗馆、茶书院、主题邮局、静吧、传统小吃展示中心(唐公肉燕)、特色民宿等修缮改造项目,价格公道、品质上乘,深受游客好评。

传统村落保护模式六:社区主导开发模式 社区主导开发模式指的是把发展旅游业作为社区共同的目标,社区通常采取成立全资旅游开发公司,并合理利用传统村落丰富的旅游资源,社区居民分担旅游业发展的责任,并分享旅游业发展的成果。

案例:安徽西递村。西递村始建于北宋年间,2011年荣升为国家5A级景区。由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成立西递旅游服务总公司,采用村办公司的形式自主经营,西递村80%的劳动力参与到村办餐饮、住宿、娱乐设施、古玩及其他旅游商品店等的经营与管理中。每年公司的门票收入,在上缴税收以及用于公司的日常经营、管理费用后,取一部分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西递村的保护资金。余下收入,公司与西递村按照1:1的比例分配。除20%留作村集体公积

<sup>①</sup> 浙政办发[2016]84号,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指导意见,2016年8月1日。

金、公益金外,其余的 80%在村民之间分配。公司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和商机,村民受益面广,农户生活水平大幅提升<sup>①</sup>。

**传统村落保护模式七:公司主导开发模式** 公司主导开发模式指的是由旅游开发公司主要负责传统村落的旅游经营和管理的工作,是外源式的旅游开发,社区发挥监督职能介入旅游公司的管理,公司通常采取买断经营权或独家经营权形式,无传统村落旅游资源所有权。

**案例:安徽宏村。**宏村始建于南宋,位于黟县东北部,被盛誉为和谐利用自然山水的典范,儒家文化与徽派当地文化思想下的东方传统村落的人居环境的代表。宏村主要采用外源式(企业外包)旅游开发模式,1997年起,采用转移经营权方式,引入黄山京黟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对宏村古村落进行旅游利用。2015年,宏村景区全年接待旅游总人数 185 万人次,实现旅游门票收入 1.21 亿元,宏村全镇旅游综合收入达到 9.6 亿元。十二五期间,宏村镇农民人均收入由 7080 元提高到 12960 元,年均增长 16%以上,其中宏村景区村民收入的 60%以上来自于旅游业。

**传统村落保护模式八:综合开发模式** 综合开发模式指的是企业、社区与农户多方共同开发传统村落的模式,公司发挥资本、市场优势,社区监督公司并引导农户,发挥中间协调纽带作用,农户参与旅游开发及经营,分享成果。

**案例:浙江荻港村。**荻港村因“倚港结村落,荻苇满溪生”而得名,历来文化昌盛、名人辈出、古迹众多,古桥静卧,建筑成群。荻港村实施历史文化村落保护利用计划以来,修缮了三瑞堂、桂花林老宅、古树坛、十景塘、朱五楼故居、里巷埭建筑群等一批历史古迹,同时加大设施投入,完善交通路线建设、引导标识系统,导游全景图等内容<sup>②</sup>。2015年,荻港村被评为国家 4A 级景区。荻港村良好的旅游基础条件获得了旅游上市公司的青睐,企业将村内“七古”资源评估作价 1.2 亿入股,再现金出资共同进行旅游开发,农户参与旅游经营,社区入股收益主要用于村民的养老金补贴。为保障村民原有的生产生活不被打扰,核心区 1.3 平方公里只做修缮性开发,核心区以外修建大型接待、娱乐服务设施。

改变物品的属性,另一种方式是使传统村落具备非竞争性,即成为公共物品,这种解决方案所对应的传统村落保护实践为博物馆模式和保护区模式,目标是让政府公共事业部门对传统村落保护发挥监管作用。

**传统村落保护模式九:博物馆模式** 博物馆具有非营利性、公益性、教育性和多元性的特征,部分传统村落与博物馆的特征相近,都可以归政府文化部门管理。传统村落通过博物馆模式保护的优势有以下三点:首先,这是最直接有效的保护模式,将历史民居和生活细节作为文物都完整地保存下来,甚至还可以动态展示;其次,国内外有各类形式多样的博物馆,设立传统村落博物馆,可以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其三,有效解决原住民传统村落保护财力和能力不足的问题,由政府财政统一支付。

**案例:贵州上郎德苗族村。**上郎德苗族村博物馆距雷山县城北 13 公里,是一个有百户人家的苗族村寨。1986 年对外开放,归属省文化厅管理,本着景区属于人民的理念,免费开放。郎德上寨清雅不俗、山水林田文物兼有的古朴苗寨,以其极富传奇式的色彩和浓郁的民族文化吸引着中外游客,多位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几十个国家的贵宾都曾前来视察参观,至今已接待参观游客 100 万人次以上。上郎德苗族村博物馆本着“保护第一,发展第二”的理念,

<sup>①</sup> 段德罡、田涛:《偏远民族地区古镇旅游开发与经营模式研究》,《小城镇建设》2010 年第 12 期。

<sup>②</sup> 《南浔荻港村:传承耕读文化建设“世外桃源”》,浙江城镇网,2016-03-04, <http://town.zjol.com.cn/system/2016/03/04/021049854.shtml>



尽最大可能保持着地方民族文化和生态文化的完整性。

传统村落保护模式十:保护区模式 保护区模式指将一个区域内形态相同、人文相关的一些村落(传统村落群)整体地保护起来。每个村落看上去都是个体,实际上村落间历史生命彼此相关。对这种“传统村落群”,如果采用单一的个体化保护便会割断它们的历史脉络,使其人文变得孤立而单薄。建立传统村落保护区,有助于村落人文的相互支持以及历史记忆的传承与传统生命力的保持<sup>①</sup>。

案例:河北井陘县。井陘县是中国第一个传统村落保护区,“中国传统村落保护区”规划范围包含井陘县天长镇、于家乡、南障城镇、秀林镇四个乡镇的24个村庄。井陘县已建成4个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31个中国传统村落。2015年河北省199个立档调查的传统村落中,井陘一县就有58个。该县318个行政村和616个自然村中,现存千年以上传统村落73个,500-1000年的传统村落110个,300-500年的传统村落70多个,符合传统村落四项条件的更是达到246个<sup>②</sup>。

#### 四、结论与展望

传统村落是我们踏访历史、展望未来的时空桥梁。面对传统村落正在不断消亡的现实,我国传统村落保护任重道远,除了上文中提到的十种有形的保护模式之外,还要将有形保护与无形保护相结合,例如开展“中国传统村落记忆”相关调查,以图文结合的方式将传统村落的各方面信息记录下来,为国家这一重大的历史文化资源与财富立档。

中国地域广阔,东中西部发展不平衡,即使在同一个省份,其梯级发展特征也十分明显,各区域传统村落保护的侧重点不同,应该因地制宜地采用适合的保护模式。本文提出了传统村落保护的十种模式,利益主体存在较大的差异,进一步分析传统村落不同保护模式下,各相关利益主体的利益诉求、矛盾及其协调是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 [参 考 文 献]

- [1] 伽红凯,王树进.我国农民集中居住的阶段转变与策略引导[J].南京社会科学,2015,(10).
- [2] 阿玛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颐、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 [3] 伽红凯,王树进.集中居住前后农户的福利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对江苏省农户的调查[J].中国农村观察,2014,(1).
- [4] 罗一南.明代海防蒲壮所城军事聚落的整体性保护研究[D].浙江大学,2011.
- [5] 刘馨秋,王思明.中国传统村落保护的困境与出路[J].中国农史,2015,(4).
- [6] 段德罡,田涛.偏远民族地区古镇旅游开发与经营模式研究[J].小城镇建设,2010,(12).
- [7] 冯骥才.传统村落保护的两种新方式[N].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

<sup>①</sup> 冯骥才:《传统村落保护的两种新方式》,《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

<sup>②</sup> 《走进中国第一个传统村落保护区》,中国乡村发现,2016-06-09, <http://www.zgxcfx.com/zoubianxiangcun/86487.html>